

DE GAULLE ET CHURCHILL



巨人之情 ——戴高乐和丘吉尔

〔法〕 弗朗索瓦·凯尔索迪 著

周以光 译

华夏出版社

巨人之情

——戴高乐和丘吉尔

〔法〕弗朗索瓦·凯尔索迪 著

周以光 译

华夏出版社

1990年·北京

DE GAULLE ET CHURCHILL

François Kersaudy

Librairie Plon, 1982, Pour l'édition française

巨 人 之 情

——戴高乐和丘吉尔

【法】弗朗索瓦·凯尔索迪 著

周以光 译

•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柳芳南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本 15.5印张 370千字

1990年1月北京第1版 1990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7000册

ISBN7-80053-684-X/K·039

定价, 8.10元

这是第一本完整而详尽地描述戴高乐和丘吉尔关系的著作(1940—1965)。作者弗朗索瓦·凯尔索迪参阅了6个国家(法国、英国、美国、加拿大、荷兰、挪威)的20多类档案,访问了无数当事人,引用了大量新材料,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战后约25年间的历史事件为背景,把两位伟人30多次会面的前后经过再现于读者的眼前。国外评论界高度评价此书,认为本书揭示了40年来有众多争议的某些历史问题的真象,并且作者能客观公正地分析戴高乐和丘吉尔、自由法国和它的主要盟邦英国之间的矛盾。作者笔下的戴高乐和丘吉尔个性鲜明、充满人情味,他们的关系时而亲密无间,时而不共戴天,富有戏剧性。本书内容真实可靠、文笔朴实无华、语言风趣动人,专业研究人员、历史爱好者和普通读者都将从中获益。

目 录

引 言	(1)
第 一 章 亲法和仇英	(15)
第 二 章 暴风雨	(26)
第 三 章 毁灭	(37)
第 四 章 洛林十字架	(67)
第 五 章 同盟	(94)
第 六 章 第一次冲突	(127)
第 七 章 “所谓的自由法国人”	(152)
第 八 章 背信弃义的阿尔比安	(174)
第 九 章 权宜之计	(205)
第 十 章 强迫婚姻	(226)
第十一章 统一的道路	(254)
第十二章 承认	(281)
第十三章 占领区盟国军政府还是 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	(301)
第十四章 最漫长的一夜	(339)
第十五章 解放	(363)
第十六章 英国的死敌	(397)
第十七章 真诚谅解	(431)
注 释	(444)

引 言

1911年10月出任英国海军大臣的是一位非同一般的人物。他的显赫出身以及他父亲短暂然而辉煌的业绩在当时的大不列颠是众人皆知的。人们也深知他作为青年军官在印度、苏丹、南非等地服役时屡建战功。他还是一位杰出的演说家、天才的作家，此外，他又先后作为下议院的保守党议员、自由党议员，殖民部副大臣、商业部大臣和内务部大臣从政约10年。而所有了解温斯顿·斯潘塞·丘吉尔的人以及所有在他任职初年曾与他共事过的人都知道他身上还集中了多种不同寻常的优点：高度的勇敢精神和英勇行为、顽强的毅力、惊人的想象力、非凡的记忆力、对国家及其制度的完全忠诚，最后，他狂热地追求非常事件，并热切期望总有一天参与进去。而1911年当欧洲局势日趋紧张时，这样的事件显然正在酝酿之中，新上任的海军大臣必将有机会大显身手。

一进入海军部，温斯顿·丘吉尔便毫不放松地建设海军，以便对付可能爆发的冲突。尽管直到最后一刻，丘吉尔仍希望不致发生冲突，但终于认识到这是不可避免的，从此他就以惊人的激情和果断精神开始行动了。1914年7月28日，未等英国内阁决定，他就命令第一舰队开赴其设在北海的军港。5天以后，英国参战，英王陛下政府的所有成员对于海军大臣在履行自己职责和执行上级命令时所表现出的想象力和冲动气质无不惊讶万分。确实，从那时起，温斯顿·丘吉尔便不间断地战斗到战争结束，甚至直到战

后一段时期。

从1914年10月起，作为海军大臣，他已经同时行使国家防空指挥权了，他向法国派遣了三支海军航空兵纵队、一个炮兵营和一些装甲汽车。为了视察防线和鼓舞部队斗志，他曾先后六次渡过英吉利海峡，最后在被围困的安特卫普登陆，从那里他向首相发出一份电报，要求允许他辞去海军部的职务，以便能够亲自领导安特卫普保卫战……

回到伦敦后，温斯顿·丘吉尔为了使英国战略具有绝对的进攻性而加倍努力工作。当某个计划、某点设想、某种新创见有利于使盟国在战场上占有某种优势时，海军大臣会毫不迟疑地紧紧抓住、立即采纳。1914年11月，丘吉尔亲自组织海军航空兵多次空袭腓特烈港的齐伯林飞艇库；在此举的数星期前，他曾在同僚和军队领导面前力主建造“带有装甲掩蔽室并装有履带的拖拉机”；^①不久，这些最初的坦克就由他亲自监督在海军部制造出来。与此同时，丘吉尔还参与制订了一个攻击德国博卡姆岛的计划，但很快他便放弃了该计划，赞同一个更为大胆的方案，即强占达达尼尔海峡，进入黑海，向俄国伸出援助之手。为缩短这场在法国北方泥潭和战壕中拖延过久的战争，丘吉尔认为上述方案显然是长期以来所探求的良策。但不幸的是，海军对达达尼尔海峡土耳其阵地的攻击以及登陆盖利博卢半岛的军事行动接连受挫；作为力主采取这项军事行动的温斯顿·丘吉尔要为计划的失败承担责任，不得不辞去海军大臣的职务。

丘吉尔被降到一个荣耀而清闲的职位：兰凯斯特公爵领地大法官。1915年5月以后，他除了在当地行政官员任命书上签字外，别无他事。然而，长期让他与战事隔离是不可能的。不久，他就开始写出无数备忘录抨击首相、陆军部和他在海军部的继任，涉及的问题有：巩固东部战场、改善坦克生产、建立一支独立的空

军部队、再次袭击达达尼尔海峡,甚至“立即由一支法英联军进攻土耳其和保加利亚,并且由英国以日本枪支武装15000名俄国人加强这支军队”^②……

当丘吉尔得知英国政府准备不顾一切撤离达达尼尔海峡时,他辞去了公爵领地大法官的职务,从1915年11月起再次出现在法国前线,在那里他作为少校在近卫步兵第一团内服役。冒着德国大炮无休止的轰击,他在佛兰德尔泥泞的战壕里待了6个月,所有和他在一起的人众口一词地说丘吉尔简直被战争迷住了,全然不顾危险。^③1916年春,丘吉尔少校回到下议院,抨击政府过于迟疑的战争政策。但是各政党不支持他,议会也不支持他,因为自达达尼尔海峡的失败以来,他始终受到来自报刊的攻击;在等待了15个月之后,他才在劳尔·乔治的内阁中被任命为军需大臣。在这个岗位上,他再次表现出人们早已熟知的、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品质。这位新军需大臣不仅仅满足于把军需生产和战备生产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组织大规模的坦克生产、不断地巡视战场、向首相发出大量劝告和建议,他还开始了制订旨在加速德国失败的大胆的战略计划。尽管这些计划往往不能受到英王陛下政府的认真对待——有时这样更好——然而对劳尔·乔治政府来说,丘吉尔先生的非凡毅力和创造精神直到第一次大战结束始终不失为一份宝贵的财富。

随着和平时期的到来,丘吉尔已身居陆军和空军大臣的要职。在职期间,他领导了英国对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干涉。然后,他当了3年殖民大臣后又回到保守党,出任财政大臣职务。但是,1929年以后,在印度问题上他和本党发生冲突,1931年便退出保守党“影子内阁”。从此时开始,直至30年代末,丘吉尔在英国政治舞台上成为一个孤立的人。但是过了不久,欧洲事态的发展就给他提供了新的出山理由;这里指的不是别的,而是捍卫大不列颠、甚

至整个欧洲文明，以抵抗德国纳粹的灾祸。

确实，丘吉尔比他的同胞更早意识到拉姆齐·麦克唐纳首相奉行的裁军政策所冒的风险，而此时，极权思想正在欧洲不断蔓延。1931年6月29日，首相在下议院声称他将尽力实现“一揽子”缩减欧洲军备水平，从而使英国在裁军道路上走得更远，温斯顿·丘吉尔立即参加辩论，着重指出英国已经极端脆弱，它的陆军已缩减到最低限度，仅相当于一支“改良的警察部队”，而空军则仅等于法国空军的1/8。^④

随着阿道夫·希特勒逐渐走向极权统治，丘吉尔对麦克唐纳先生和平主义政策的抨击日益尖锐。1933年3月23日，丘吉尔声称，过去4年中，麦克唐纳先生的外交政策使英国“更加软弱、贫困和空虚”，从而“大大加速战争的临近”；至于日内瓦裁军会议，丘吉尔称它是一幕“庄严而持久的喜剧”。^⑤同年，当约翰·西蒙先生呼吁签订一个有关裁军的国际公约时，丘吉尔回敬说，英国的裁军已经“走到深渊的边缘——我说的是已经走向深渊之中”。^⑥1934年7月，他把这一切概括成一句雄辩而尖刻的话：“最近几年来，我们见到的是各国关系在不断恶化，敌意在不断加剧，军备库存在迅速而持续地增长……尽管标志我们时代特征的是无休止的滔滔不绝的动人演说和结论、大量崇高感情的表露，以及泛滥成灾的宴会。”^⑦

从那时起，丘吉尔从未间断过向政府呼吁加强英国国防。使空军人数增加两倍，甚至四倍，建立国防部和供应部，使舰队现代化，加强英国和欧洲大陆的联盟，支持国联。在无数演说和文章中，他揭露德国进行清洗、种族迫害、扩军备战、重新武装莱茵兰、吞并奥地利、侵占捷克和威胁波兰。在更多的文章和演说中，他指出德国正以高速度重新武装。1934年，他提醒他的同胞和政府，德国空军已相当于英国空军的2/3；1935年说德国

已达到和英国相匹敌的程度；1936年指出德国空军已超出皇家空军50%；最后在1938年，他说德国空军正好等于英国空军的两倍。丘吉尔能言善辩、充满说服力的言辞中巧妙地夹杂着讽刺和挖苦，他不停地揭露英国扩军备战的缓慢，他时时求助于议员和舆论。1936年11月，在一次有关国防预算的辩论中，他向下议院宣称：

“海军大臣在昨天晚上的演说中对我们说：‘我们不时地反复观察局势。’他向我们保证，局势变幻无常。我确信这是事实。大家对局势都看得很清，只是政府下不了决心，或者说它不能促使首相下决心。因此它的举动很古怪，果断地采取犹豫不决、优柔寡断的态度，坚决地使事物任其发展，强烈地主张随波逐流，根深蒂固于自身的软弱无能。”^⑧

但是一切都徒劳；拉姆齐·麦克唐纳无可挽回地走上了和平主义的道路，他的继任斯坦利·鲍德温担心重整军备会有损保守党的竞选立场，而内维尔·张伯伦自以为直接和独裁者协商便可避免战争。就这样，三位首相把所有对他们政策的抨击都一一驳回，否认以往的错误和当时的疏忽，对不利于他们的扩军数字表示怀疑，把丘吉尔比作一个善于散布令人惊慌的消息、论点站不住脚、具有好战性格的捣蛋鬼。因此，在30年代，丘吉尔和政府是疏远的，在议会中始终是孤立的，他那雄辩的抨击在他的同僚和尚不了解整个时局严重性的公众中反应不一，有的欣赏，有的感到有趣，有的无动于衷。如同菲利浦·格达拉先生后来指出的那样：“丘吉尔先生的反复警告成了像清真寺上报祈祷时刻者的声音一样为人们所熟悉了。”^⑨

不管这段穿越沙漠的长途跋涉对丘吉尔来说可能多么恐怖——莫顿少校甚至写道，“他酷似一个被砸坏了的玩具孩子”^⑩——应该承认丘吉尔没有彻底失望，也不完全孤立。他确信自己看清了过去事件的含义及其将来的后果，总之早在1921年，他就

告知他的同胞，“如果对目前存在于法国和德国之间的令人可怕的怨恨、猜忌和仇恨不加以注意，就必然会导致在一代人之后重蹈刚刚结束的这场冲突的覆辙。”^① 11年后，即1932年，他发表了更具有预见性的言论：“所有这些成帮结伙、跑在德国街头和公路上的身强力壮的年轻德国人心中激荡着为祖国母亲去赴汤蹈火的渴求，他们……想要武器，一旦武器到手，请相信我，他们就会要求把他们失去的领土和殖民地归还他们，其结果必然从根基上动摇，甚至摧毁我刚才谈到的所有国家……甚至一些我没有谈到的其他国家。”^②

丘吉尔确信自己已经理解希特勒的真实意图及其全部含义，如同在1915年那样，他一刻都没有怀疑自己有能力动员全国的力量，并领导全国人民投入这场正在酝酿中的急风暴雨。此外，还有一些人也抱有与他同样的信念，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公众和这位表面孤立的人进行了接触。其中的第一位也许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与丘吉尔相识的莫顿少校。那时莫顿少校在“工业情报中心”工作。这个机构的创立是为了密切注意德国工业的发展动向，不久以后，他向丘吉尔提供了一些有关德国重整军备的极为精确的材料和数据。^③ 自1935年起，外交部的一位官员拉尔夫·威格拉姆也向丘吉尔提供他部里所搜集到的有关德国航空工业生产的所有情报，而政府本身对这些情报却并不重视。几个月后，海军大臣查特菲尔德海军上将在写给丘吉尔的一封长信中谈及英国海军的弱点和问题。^④ 1936年5月以后，英国皇家空军训练中心负责人空军中队长托尔·安德森也向丘吉尔提供了英国空军所存在的人员、装备以及训练方面严重不足的情况和数据。几个月过后，皇家坦克军团总监察员霍巴特准将要求就重要而机密的问题与丘吉尔交谈。当然，丘吉尔运用所有这些情报在下议院对政府在国防政策方面的疏忽进行了揭露。

其他一些文职官员和军方要人也以不那么秘密的方式向丘吉尔提供情况，甚至尽力呼吁要求给予他发挥才干的机会。因此，新的空军大臣菲利普·坎利夫-利斯特爵士1935年7月请求斯坦利·鲍德温首相允许丘吉尔参加有关防空部队的研究小组委员会。^⑤经鲍德温同意，丘吉尔便参与了委员会的工作，这使他有可能会获得防空部队的大量情报以及广泛了解这类委员会所固有的弱点。在以后的几年中，很多高级官员力图向他证明扩军备战是在令人满意的条件下进行着。总参谋部长向他递送了一份有关装甲车建造计划的备忘录，空军大臣自愿带他参观新的雷达装置。^⑥丘吉尔总是显出兴致勃勃的神情，但也指出很多缺陷：中型装甲车的建造尚属空白、雷达工厂生产的雷达设施不能有效地防止空袭。总之，丘吉尔通过这些情报和参观积累了大量有关他的国家在国防状况和能力方面的知识。

还存在另一个原因使丘吉尔在长途跋涉于沙漠中时没有陷于孤立，那是因为他的政敌，包括所有那些在11年中竭尽全力把他排斥于政府之外的首相们从不否认温斯顿·丘吉尔无可辩驳的优点，他们的行动也证明了这点。1929年，丘吉尔向德斯蒙德·莫顿少校询问有关国防的某些秘密情报，当后者去请示拉姆齐·麦克唐纳首相应如何做时，首相回答他：“告诉他所有他想知道的——让他了解一切。”他甚至写了书面准许书，这种允诺也被他的继任所确认。^⑦如果他们考虑到这些秘密情报会被丘吉尔用来揭露他们政策中的漏洞，那么他们将懂得这样的让步使他们不得不付出昂贵的代价。然而，这样的特许始终未被取消，原因很简单：唐宁街的主人非常了解丘吉尔，他们意识到一旦战争爆发，与丘吉尔合作将成为取得胜利的至关重要的保证。早在1935年11月，斯坦利·鲍德温就写信给他的一位朋友说：“假如战争爆发——谁也不能说不可能爆发——我们应该留住他充当我们的战时内阁首

相。”^⑧甚至张伯伦，他虽曾把丘吉尔描绘成“一个极难共处的同事”，^⑨都不怀疑战争会把他带到前台。“战争越临近，”1939年1月他写道，“他越走运，反之亦然。”^⑩

不幸的是张伯伦直到最后一刻仍以为有可能避免战争。他甚至对他的朋友说：“温斯顿·丘吉尔进入政府就等于向柏林宣战。”^⑪1939年夏天，年已65岁的丘吉尔惊愕而密切地注视着这场威胁欧洲和平的致命灾祸。在35年的政治生涯中，他获得的政府经验比英国全部历史中任何一位首相都更丰富、更多样；整整10年，在没有任何政党支持的情况下，他竭力避免了自己的国家在侵略者面前解除武装；在30年中，他精确地了解了自己国家的潜力和国防力量，他认为为了调动这些力量，他一个人就拥有必需的能力、想象力和胆量。然而，当希特勒准备入侵波兰时，丘吉尔还仅仅是下院中的一个普通议员。

1912年10月，一位22岁的少尉毕业于圣-西尔军校，他的一位教员在他的军籍簿上写道：“一切皆属中等，除了身材。”^⑫这是一种极为缺乏眼光的评论，因为在夏尔-安德烈-约瑟夫-玛利·戴高乐身上远不是成绩中等的问题。那些比较客观的老师和他的同届同学都发现他具有广博的历史知识、惊人的记忆力以及对军人职业的强烈感情。此外，他的父亲、严峻而博学的亨利·戴高乐传给了他“某种对于法兰西的观念”，这种观念完全是由对祖国过去的光荣传统以及对祖国今天利益的尊重和忠诚混合而成的。

“总之，我不怀疑，”夏尔·戴高乐后来写道，“法兰西必将经受严峻的考验，人生的意义在于有一天要为它完成某项重要使命，而我自信将有机会接受这项使命。”^⑬

1913年，戴高乐少尉返回驻扎在阿拉斯的第33步兵团，团长是一个尚不出名的军官菲利普·贝当上校，他在战略方面的异端思

想似乎很难预示他在军旅生涯中能取得辉煌成就。• 1914年8月2日，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戴高乐晋升为中尉，在第33步兵团第1营服役。

在马斯河尸横遍野的战场上，在香槟省前线泥泞的战壕中，在凡尔登荒芜的废墟里，戴高乐中尉，后来是戴高乐上尉英勇善战，曾三次负伤。第三次是在1916年3月2日，在杜尔蒙，当他带领自己的连队与敌人进行白刃格斗时身负重伤。在法国国内，人们以为他已牺牲，这段时间里已成为法军显赫人物的贝当将军追授他荣誉勋位勋章，并给予他高度评价。••但是戴高乐少校没有死；他被德国人俘虏后在德国的俘虏营里一直待到战争结束。

在弗雷德贝格和因戈耳施塔特囚禁期间，戴高乐没有消极地虚度光阴。除了他曾作过多次未遂的越狱尝试外，他始终密切地注视着战争的进程，并向他的难友们作关于军事战略新发展的演讲。•••其中有一点特别引起他的关注，那就是从1917年春天开始战场上坦克的出现。

1918年11月停战，戴高乐上尉结束了被迫的流亡生活。1919年5月，他和波兰军队一起攻打苏联人，然后去华沙附近的雷姆贝托军官学校教授步兵战术。1921年底，他被召回法国，到圣-西尔教授军事史。1922年，戴高乐进入高等陆军学校深造，在那里他

-
-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盛行的军事理论是强调作为战略主要因素的步兵的进攻性作用。而贝当上校本人却不断指出筑有防御工事的阵地和炮火准备才是在一切战略主动权中起决定性作用的。
 - “连长戴高乐上尉以其超群智慧和高尚品德而受人敬仰，他的部队在遭到一次可怕的轰炸后伤亡惨重，而敌人却已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这时，他鼓动起士兵们的斗志，同他们一道投入了一场殊死的肉搏战，他认为这是与他的军人荣誉感相称的唯一办法。在混战中他倒了下去。就一个军人所应具备的素质来说，他是一位无与伦比的军官。”^②
 - 囚犯中有未来的苏军元帅杜卡切夫斯基，以及我们将在本书中会多次提到的卡特鲁指挥官。

是个颇为引人注目的人物。确实，学校的教学几乎仅仅受启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应该在事先准备好的阵地上、在大炮的全力支援下作战，这是一种几乎纯粹防御性的战略。然而戴高乐并不掩饰他对这种理论的怀疑，这使他在陆军学校的教官中不受到器重。因此当戴高乐上尉于1924年虽以出众的成绩毕业，但却被派往远离巴黎的莱茵河军团的参谋部。

然而，这位非同一般的年轻上尉却受到了来自于军界最高层——因指挥凡尔登大战而名声大振的菲利普·贝当将军——的保护。早在1913年，贝当就十分欣赏夏尔·戴高乐杰出的才能。戴高乐对陆军学校过时理论的批评态度使他回忆起自己在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盛行的危险理论所进行的孤军奋战。就这样戴高乐于1925年秋从美因兹被召回，在最高陆军委员会副主席——不是别人，正是贝当元帅本人——的办公室任职。这个职位是个闲差使，但至少使戴高乐接近了军事决策的最高机构。后来，他指挥过特雷伏第19轻步兵营，在地中海东岸参谋部工作了两年，最后被派到最高国防委员会秘书处，在那里他待了6年，以后他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

“1932至1937年，我先后在14届内阁里参与了所有有关国防的政治、技术和行政方面的研究活动……通过我所做的工作、我参加的讨论以及我应接触的一切，我既看到了我们蕴藏着雄厚的国力，也发现了国家的弱点。”^⑤

戴高乐中校的职务给他提供了一个特殊的观测点，使他得以发现许多令人担忧的事情：政府工作几乎完全瘫痪，宪法的缺陷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议会内明争暗斗；军队装备过时、思想僵化、官僚主义盛行，其理论、训练和装备自1870年以来没有什么更新，至于1918年以来的进展就更无从谈起了；参谋部对防御性战略和防御工事万能的迷信几乎到了盲目的程度。而这一切都发生在阿

道夫·希特勒已在他的国家进行大规模的重整军备之际,并且其公然践踏凡尔赛条约的意图已暴露无遗。因此很显然,法国如不尽快采取紧急措施以恢复有利于己的力量均势,就将面临灭顶之灾。怎样才能达到目的?经过长期的思考和观察,戴高乐中校提出了详尽的解决方案,简述在他撰写的、于1934年5月出版的、题为《走向职业军队》^⑨的书中。

这是一本从各方面都很杰出的著作,用极为地道和规范的法语写成。一开始他就回顾法国东北边疆是极其容易受攻击的,在各个时代,侵略者都能由此通过最短、最直接的路到达法国的心脏。

“围墙上的这个缺口就是祖国数百年来 的弱点……在这致人死命的大道上,我们刚刚埋葬了我们1/3的年轻一代……这个受不到保护的民族至少自己作好了准备吧?没有,整整20个世纪中都没有作好准备!”^⑩

第20世纪也不是例外:法国不能仅靠防御工事进行守卫,危难时刻全民入伍的制度不再适合于现代战争的要求,而服役期限却不断缩短,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从3年被减至1年。体制的弱点以及法国人趋于分裂的倾向都将使这幢原已不稳固的大厦更加摇摇欲坠。那么什么是补救的良药呢?

“一支职业军队”,戴高乐回答,一支由年轻、能干、忠于职守的10万人组成的军队:问题在于使法国军队重新获得它在第一次大战的战壕中失去的机动性和活动能力。这种绝对进攻性战略的工具就是:6个装甲的、装有履带的、完全摩托化的新型师,它们将构成法国军队的尖兵。每个师由3个旅组成:1个拥有500辆装甲车的装甲旅以攻克阵地,1个摩托化步兵旅以占领阵地,1个炮兵旅为前两者作掩护;整个这支部队都由1个侦察团和一些工程营、通讯营和伪装营辅助。总而言之,这是一支由精兵和专业人员组

成的部队，具有极大的机动能力、毁灭性的火力以及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插入任何战线的能力。这就是用以保卫这个在危急时刻易受攻击的民族的一把利剑。法兰西必须不失时机地抓住这把利剑。•

为了让人们接受他的主张，戴高乐中校竭尽全力，在他的事业中他得到了几位忠实朋友的帮助，例如埃米尔·梅耶中校、吕西安·纳尚上校、让·奥布尔旦律师。在议员中他也有几位同盟者：马赛尔·德阿、菲利普·塞尔、雷奥·拉格朗热，也得到某些右派和左派报纸的援助，诸如《巴黎回声报》、《时代和秩序报》。此外，他还获得前财政部长、颇有影响的政治家保尔·雷诺的积极支持，后者允诺在议会的讲坛上对他的方案表示支持。最后，当时的陆军部长不是别人，正是贝当元帅。可以想象，依靠所有这些人物，戴高乐中校的方案将能付诸实施。

然而并非如此。一方面，78岁高龄的贝当元帅对新思想不再那么容易接受；此外，他和戴高乐的关系也不再很融洽，不久后变得越来越紧张。••保尔·雷诺在议会支持了职业军队的设想，3月15日，他甚至还提出一项法案，旨在“立即建立1支包括10个前线师的专门化部队……要由签订合同服役的军人组成，这支部队至迟应该在1940年4月15日完全建成”。但是左派对职业军队持否定态度，因为这支军队有可能成为来自右翼的某次政变的工具，右派始终是军事委员会和参谋部的保守陈腐观念的追随者，而中

-
- 这个建议并不新鲜。埃蒂安纳上校早在1914年就提出非常相似的说法，他在坦克尚未问世的时代就要求建造400辆装甲车。战后，法国的埃蒂安纳和杜芒克将军，英国的富勒将军和利德尔-哈特上尉又完善了装甲战争的理论，戴高乐将军受到他们著作的启发——德国人也受到启发。
 - 1938年，戴高乐出版了一本历史评论《法兰西及其军队》，这部著作中有几页是戴高乐10年前为贝当元帅希望以自己的名字发表的一本预定书写的。1940年贝当元帅始终不能原谅戴高乐将军的这一“背叛”。